

官员要慎重对待自己爱好

□ 唐卫毅

玉石展。然而,倪发科众多的玉石藏品并非用自己的薪水所收藏,而是来自于各路商人、老板的慷慨馈赠。

把弄文玩已是当下民间的一种时尚,尤其是以玉石为首的各类“石头”,其价格也是翻着跟头般的翻番上涨。如果说一些官员退休之后,将把弄文玩当作晚年生活的一种消遣和修身养性的事情也就罢了。问题在于,现在有不少的官员在任期间,却把自己的这种喜好当成了权钱交易的筹码,以自己的喜好为诱饵,进行非现金式的敛财。比如,收受、索要价值不菲的奇珍异石等,以满足自己的爱好,那可不就是一般的玩玩的性质了,而是名副其实的“雅贿”,或许,有人说,收藏各种“石头”完全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又不是收受现金、有价证券,大可不必叫真。其实不然,像倪发科花空心思收集各种玉石,已到爱玉成痴的地步,那些开发商、各路有求于他的老板能不投其所好?能不花费大价钱竭尽心

力满足他追求玉石洁白无瑕品质的要求吗?如此说来,再贵的玉石也有价,只要有价,就难逃受贿的嫌疑。

其实,现如今,像倪发科爱玉成痴的官员还有很多。不少官员,以业余爱好、鉴赏古玩为名,笑纳各路人士馈赠的各类“石头”,虽说有的尚没有达到爱“石”成痴的程度,但是也几乎到了沉溺不能自拔的地步。比如,除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和田玉石之外,一些奇珍异石、一些价值不菲的上等石头也进入了官员的收藏之列。除了喜欢收藏各种“石头”,有的官员甚至对“石头”的研究远远超过了对本职工作的研究并且颇有造诣,有的已经能够充当一定级别的鉴赏师、鉴石师,说起来,一些官员平时不学科学理论,不学经济管理,不学法律知识,反而整天热衷于研究、摆弄、鉴赏各种“石头”,且说起“石头”的来历、产地、价值等如数家珍、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这实际上暴露出一些官员为官从政的思维和方向走偏,也可以

说是典型的在其位不谋其政。

官员不是各类石头的鉴赏家,不是各种文玩的收藏家,而应当是现实当中的政治家和实干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官员的职责所在,如果把心思都用在研究“石头”上,敢问这样的官员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各种政务吗?

古语说得好,玩物丧志。这个“物”泛指一切可以消磨人的意志,浪费时间和财力的东西。作为官员,不是生活中的普通人,而是权力的拥有者,尤其要把玩物丧志作为对自己的一种警示。当然,官员不是不可以有个人喜好,不是不可以搞点业余文化生活,但是一定要适度、要适度,最好等退休之后再潜心研究,修养身心。既然现在为官从政,就要为好官、从好政,干该干的事,做该做的事。不然,整天打听哪里有好石头,哪里的石头最值钱,恨不能天天沉浸在拥有大量珍奇石头的喜悦之中,试问,这样的官员还能专心致志,一心一意谋划工作,为民造福吗?

小心国企车改“由补变腐”

□ 钱凤伟

总经理每月6800元,副总经理每月4800元,部门正职与副职每月分别为3600元、3200元……这并不是企业工资单,而是深圳一家国企近日出台的公车改革补贴方案。该方案被不少网友戏称为高于政府司局级标准的“最牛车补”。(10月30日新华网)

据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我国公车改革步入“深水区”,国企改革也正提上日程,但现有的标准,规定主要还是针对党政机关。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使得部分国企从“公车浪费”走向“滥发车补”。比如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的车补,超过了司局级的4倍。

本来,“较高的自由裁量权”,是企业应该享有的自主权,于企业的发展也不可或缺,但众所周知,如今也正是所谓“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为某些国企领导滥用。不必讳言,现在不少国企,职工普遍缺乏知情权、话语权,而且即使有问题职工一般也不敢提,而国企自设的相关监督制约部门,一般也不敢履行职责。这样,在内外监督难以到位的情况下之下,大多数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不少国企领导以企业自主为名,搞一些权力自肥的小动作。实际上,这种自定标准的车补,已是只有“更牛”没有“最牛”,而且其他的漏洞也不是没有,媒体披露的某些国企巨贪,令人触目惊心。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改革“由补变腐”,可能只是国企腐败的冰山一角。因此,强化对国企领导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包括将“较高的自由裁量权”置于公开透明的监督之下,已是当务之急。

别让“老人摔倒扶不扶”成为永远纠结

□ 尹鹏志

老人摔倒无人扶,已经不是新闻。一位苏州大妈摔倒求助,连喊“不讹你们”10分钟没人理睬,幸亏一名干过记者的小伙子帮忙报警,才挽救了道德的最后颜面。老人摔倒扶不扶,国人依旧纠结着。(10月30日《现代快报》)

助人之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面对老人摔倒无人扶的道德窘境,有人感到气愤,而一旦身临其境,却难免会选择不扶。今年以来,救人反被讹的事情依旧频频出现。9月25日,南通老人骑电瓶车摔倒,小叔救助垫付医疗费反遭索赔;9月30日,潍坊男子扶起摔倒老被其家人打伤。“扶人者反被诬陷为撞人者”的新闻频频出现之后,甚至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的社会讨论。

公民的良心是整个社会的良知,面对社会道德良知的沦丧,扶不扶摔倒的老人,怎能不让人纠结。毋庸置疑,“彭宇案”之后,扶摔倒的老人已经成了社会难题,尽管公众疾呼舆论关注,却难以改变道德与法律冲突的窘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每个人都变老,每个老人的境遇都可能是我们自己。在依法治国当下,司法必须给予讹诈者严厉的惩戒,让见义勇为者有更多的支撑。总之,期望“老人摔倒扶不扶”纠结别再持续下去。

职称“双通道”评审 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 韩虹婷

据10月30日《新华日报》报道,今年3月,江苏科技大学出台《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的补充规定》,一线公共基础课教师高于省定高级职称评定条件,但在本校科研项目、论文排序落后的,可用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和学生评价等5项教学成绩补差,这种“双通道”评审办法,为全校700多名一线公共基础课教师打开了一扇晋升高一级职称的希望之门,今年有4人因此评上副高级职称。

高校教师评职称不再墨守成规“唯论文”,而是注重以教育育人的实绩作为关键条件,这种一反常态、照顾实际的做法,能够鼓励广大高校教师走上教学第一线,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广大学子,切合了高校教育的实际需要和广大教师的期盼,让人感到振奋。

多年来,在不少地方、不少行业,特别是教育领域,教师评职称非得凭论文,使不少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的优秀教师不能评定上高一级职称,使他们对待遇的提升“望而却步”,打击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多年来,我国人事部门对事业单位技术人员的工作热情,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制度一成未变,主要指标常以论文论“英雄”。假如没有在

相关报刊发表论文,事业单位技术人员的工作水平再高,也不能申报高一级职称评审,这使不少责任心强、工作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工作人员与晋升高一级职称无缘,成为不少人的工作和生活之痛。

诚然,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制度是考核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业绩的有效手段,但要根据实际情况特别是根据从事岗位的不同,制定出更加符合实际需要的评审标准。这就需要人事部门对职称评审制度进行改革创新,落实以人为本,注重个人工作实效的精神。比如,对于广大教师的职称评审工作,要注重把教育育人的实绩、师德、群众认同等作为关键的评审条件,不要把论文作为不可更改的硬条件。

可以说,江苏科技大学出台以科研项目、论文排序和以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和学生评价等业绩内容补差的“双通道”评审办法,为一线公共基础课教师和其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打开了一扇晋升高一级职称的“希望之门”,这有助于激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有助于他们一门心思地工作,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这样的做法,值得向各行业推广。

漫画

作者/ 张建辉



10月24日下午1时50分,西安市南大街上,4个卖小吃的摊贩将卖货的车子推上街头,看着有人来买东西,他们热情地招呼着。对于在不远处的城管执法车,商贩根本不在眼里。一位商贩告诉记者,他

们都配备有对讲机,只要城管执法人员有行动,他们就直接从对讲机内先听到“风声”,随后就将小车子推到背街小巷内躲避。等执法人员走后,就又出来摆摊。(10月26日《华商报》)

弘毅明德知行合一 培育现代士人精神

——山东社科论坛·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研讨会观点摘编

【编者按】

由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山东社科论坛——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研讨会,于2014年10月15日在济南举行。来自省内各高校、党校、社科院所的6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现将主要观点摘编如下。

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基因

□ 王志民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第一,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价值追求的核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基因,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宗法社会,它奠定了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讲思想文化是灵魂,这个灵魂如果不传承,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国家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这个家不是我们今天的小家庭,是宗法社会。宗族是社会组织最基本的细胞。所以家和国是一体的,家为立国之本,国是家的扩充。国家、个人是一体。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个人是一体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在国和家中的责任、义务和身份。每一个人一生要追求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强调个人、家庭、国家,后面是天下。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是建立在这种国情之上,家国情怀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基因,从精神基因到个人的价值追求,是历代知识分子人生目标的核心。传播先贤圣人思想的时候,应该把家国情怀的培育,作为知识分子对人生价值追求的主线和目标。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就应该与家国情怀的培育结合在一起。

第二,家国情怀的核心是家,对家乡、故土的重视,是传统知识分子一生的心灵寄托。古代许多知识分子离乡背井去做官,所以古代文化相当多的是表达对故土的怀念和故土的留恋。家国情怀,家是核心,上面连着国,向下连着个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最主要的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把爱国放在第一位,爱国是核心、灵魂和引领。

第三,家国情怀的培育,修身是根基。中国名门望族的传承,主要是家风,而家风主要是修身,讲究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相结合。吸取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修养,对家国情怀的培育至关重要。当代人格的培育一是君子人格,一是大丈夫精神。君子人格主要是提升自己道德修养的层次和水平,大丈夫精神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

知识分子要成为中华民族脊梁

□ 杨朝明 (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论语》揭示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和精神追求,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与其一脉相承。当代知识分子要努力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有崇高的价值追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没有追求,则很难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当代知识分子既要有德,还要有道,道就是一种价值体系,天下无道就是常说的价值观混乱,社会观扭曲。只有知识分子的价值正确,社会观不发生扭曲,国家的价值体系才能建立起来,每个人的德行才会有一个标准,每个人的德行提高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容易实现。

当代知识分子要努力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还要成为一个民族最有担当的人。我们祭祀孔子,其实代表了我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礼敬。如果从深层理解,我们读懂了孔庙,才能读懂中国。从唐代以来,谁来配享孔子,谁来从祀孔子,都是官方研究决定的,而这些配祀孔子的人,都是历代的大儒。所以,孔庙就是我们的文庙,就是我国的“名人堂”或“先贤祠”。孔子以及那些配享、从祀者,正是中国的脊梁。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庙就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儒学是贴近生活的,不能把儒学神秘化,儒学体现在一个人的涵养之中。儒家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这个社会走在前头,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什么样的启迪,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追寻现代士人精神

□ 葛荃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成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于同时代世界范围内而言,最为先进的文官制度。二是一种思想催生一个阶层,构成社会政治的中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儒学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理应承继先贤遗泽,古为今用,培育现代士人精神,沟通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现代文化,推动现代社会的构建与发展。

其一,当代知识分子需要具有宽广的视界与胸怀。这是弘扬现代士人精神之首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能走出名缰利锁的缠绕,不能在心灵深处唤起为中华民族与天下、国家奋进的情怀,就谈不上知识分子的责任。

其二,责任感与回报社会。当社会责任感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形成了回报社会的道德责任自觉意识,那么中华民族的道德文明和社会政治文明的提升,便具

有了成为事实的可能。

其三,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现代士人精神的倡导,关键在于现代二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观念和法律意识,这两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成。具有现代意识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高人一等的教师爷,也不是具有特权和特殊地位的上等人。他们理应怀一颗平常心,抱一腔平民情怀,在当代中国疾步迈向现代化的路途,为文化复兴与民族崛起构建文明根基。

批判更需建设 知行务必合一

□ 甄炳罡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儒学要求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社会担当,当代知识分子更应该有超越物质层面之上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不应仅做社会的看客和批判者,而应作文化的建设者。

对现实的批判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但仅仅批判是不够的。当代知识分子最应该思考的问题,是要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时代舞台上,要以社会建设者的面貌出现。所谓建设者,就须学以致用,用所学去建设。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来提炼自己的知识,来获取滋养。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做到“在朝则美政,在野则美俗”。处在社会之中,知识分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学者,有多大力就出多大力,来改良我们的社会风气,让我们的国民都有修有养。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 何中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精神与儒学的重心是至善,即把求真和审美归结为至善,而西方是把至善至美归结为至真。至善是一个实践的领域,中国传统文化致力于对善的追求,强调实践性。中国圣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没有像西方上帝那样可望而不

可及,所以儒家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生活。因为只有生活才能孕育出真正的问题,才能孕育出与人的生命有关的问题。儒学强调知行合一,知是广义的知,道德的知,是行知,行就是知,没有一种道德觉悟,不可能做出一种道德的行。当代知识分子有一种使命感,来继承、复兴我们中国传统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学有非常相近之处。马克思说,问题就是一个时代的口号,一个时代的符号,如果抓不住问题,一定会游离这个时代,时代对人是有存在性的。马克思主义讲求知行合一,就是强调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儒学的取向非常吻合。20世纪初以来,这两种学问文化取向上的一致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儒学能够融合的内在契机,这是融合的内在原因。即使存在梁漱溟和毛泽东的两次争论,也不能证明他们融合的可能性。比如西方的基督教和近代自然科学之间,也发生了很多冲突。但是并不能因此这些冲突,就说西方的基督教和自然科学之间就没有一种建构性,恰恰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孕育了自然科学的发生。虽然其中有冲突有摩擦,并不能证明他们在文化原形上的建构性,不能用这两次争论的发生来否定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兼容的可能性。

从乡村建设运动到乡村儒学

□ 王钧林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梁漱溟、陶行知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发起和推动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全国参与这场运动的社会团体有700多个,建立了1000多个乡村建设实验区。乡村建设运动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价值追求。乡村建设运动和今天的乡村儒学在社会担当和价值追求上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中可以得到三点启示。第一,当代知识分子走向民间,走向社会,大有可为。乡村建设运动和今天的乡村儒学建设都证明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扬儒家文化,宣扬中华美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美德传统,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乡村文化建设大有可为。第二,知识分子要有奉献精神。当代知识分子也应该有传道的意识。我们是本土文化的弘扬者,建设者,要主动走向民间,走向社会,去做弘扬儒家文化的工作。第三,乡村儒学建设在内容上应该进一步扩展。当年梁漱溟先生发现中国农村有四大病:愚、穷、弱、并对症下药开展四大教育,我们今天搞乡村儒学建设,就需要去发现农村社会真正需要什么。我们不仅要讲儒家倡导的传统美德,还要从农民的角度去学习,要身体力行地去做。不仅要道德的宣讲者,还要做新生活的支持者、宣讲者,使活动形式更加灵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持久地开展下去。

(本组文章整理:阎亚男 丁伟伟)